

四川省档案干部教育培训读本

档案文化建设

四川省档案局 编

DANG'AN WENHUA
JIAN SHE

四川省档案干部教育培训读本

档案文化建设

四川省档案局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文化建设/四川省档案局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6
四川省档案干部教育培训读本
ISBN 978-7-220-10150-2

I. ①档… II. ①四… III. ①档案工作—文化事业—建设—干部
培训—教材 IV. ①G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6575 号

DANGAN WENHUA JIANSHE

档案文化建设

四川省档案局 编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何佳佳
戴雨虹
何秀兰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70mm×240mm
15
253 千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150-2
3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四川省档案干部教育培训读本”

编写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和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适应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发展新要求，提高全省档案干部培训工作水平，进一步加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省档案局组织编写了“四川省档案干部教育培训读本”，包括《档案法治与行政管理》《档案工作基础业务》《档案保管与保护技术》《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文化建设》《企业档案管理实务》《专业档案管理》《档案工作实践与探索》，共八册，主要介绍档案工作相关的理论、法规、政策、业务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探索等。读本注重指导性、实践性、可读性，紧贴实际、通俗易懂，适合各级档案干部学习阅读。

读本编写组

2017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档案文化建设导论	(001)
第一节 基本问题	(001)
一、档案与文化	(001)
二、档案文化与档案文化建设	(013)
第二节 发展现状	(031)
一、国外发展动态	(031)
二、国内发展动态	(038)
第三节 发展趋势	(044)
一、基本思路	(044)
二、发展观念	(047)
第二章 档案机构组织文化建设	(053)
第一节 档案机构组织文化	(053)
一、组织文化	(053)
二、档案机构组织文化	(054)
第二节 档案机构组织文化建设	(056)
一、基本原则	(056)
二、基本思路	(057)
三、发展对策	(059)

第三章 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基础	(077)
第一节 基本原则	(077)
一、基本含义	(077)
二、基本原则	(078)
第二节 开发基础	(083)
一、档案文化意识	(083)
二、专业人才建设	(086)
三、档案信息资源	(088)
第四章 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方法	(100)
第一节 档案编研	(100)
一、主要意义	(100)
二、基本流程	(104)
三、成果类型	(155)
第二节 档案展览	(173)
一、主要作用	(173)
二、基本流程	(179)
第三节 档案文献专题片	(188)
一、主要作用	(189)
二、基本流程	(192)
第四节 其他方法	(216)
一、档案文创产品	(216)
二、档案文化专栏	(224)
三、档案文化讲坛	(225)
四、档案文化活动	(226)
五、档案新媒体	(228)
六、数字人文应用	(229)
主要参考文献	(232)
后 记	(236)

档案文化建设导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档案事业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要大力开展档案文化建设，切实服务于“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在推进档案事业发展转型、提质增效的新形势下，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发挥档案文化建设的现实功能，不断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基本问题

一、档案与文化

档案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产物，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财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是文化记录、传承和创新的具体承载与现实表现。档案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记录，是历史的积淀，是文化的传承。档案本身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是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档案的定义

“档案（archives）”一词起源于希腊文“Αρχειν”和拉丁文“archvum”，最初指“办理公务的地方”，后演变为“存放档案的地方”，也代指“档案”本身。“档案”作为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元概念，由于观念和认识等方面的差异，尚未完全形成统一的定义。美国著名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指出：“‘档案’一词显然并没有一个不可更动而必须优先采用的、最终的、最完备的定义。”

1. 政策法规中档案的定义

目前，不仅世界各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制定了大量的档案法律和法规，许多国际和国家标准组织也制定了专门的档案标准，其中对档案的定义具有内容完备、列举全面、表述准确等特点。1979年颁布的《法兰西共和国档案法》指出：“档案是文件的组合，不论这些文件是什么日期、形式和载体材料，是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任何官方的或私人的部门或机构在自身活动中产生或收到的。”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指出：“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根据《档案工作基本术语》（DA/T1-2000），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

2. 参考资源中档案的定义

在国际档案组织、专门机构组织编写的档案辞书、词典和百科全书等参考资料中，档案的定义是重要的基础性内容，通常具有兼容并包、权威性强、用语严谨、表达规范等特点。1970年，法国档案管理局和法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的《档案学手册：法国公共档案理论与实践》认为：“档案是任何一个行政机关、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在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性质的、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档案术语辞典》认为，“档案是由那些形成它们的人或由他们的职能继任者为了自己利用的目的或因为他们的档案价值，经过挑选或未经挑选的、由某个适当的档案馆永久保存的非现行文件”。1992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是有史以来最早产生的文献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信息的重要门类”。《中国

大百科全书》从词源、起源、定义、特点、范围和价值等方面对档案的概念进行了全面分析。在 2005 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学会的《档案和文件术语词汇表》中,档案被定义为“个人、家庭或组织(公共或私人)在处理相关事务和行为中形成、接收和保存的其中的信息具有长期价值或者对于形成者具有凭证功能的材料,尤其是按照来源原则、原始顺序、集中管理的累积性记录”。

3. 专著教材中档案的定义

在国内外众多的档案学专著和教材中,档案的定义一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研究者总是力求给出一个完美的定义。由于受到一定的主客观因素制约,这些定义都具有综合性强、理论性突出、个性化明显、语言差异大等特点。1938 年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认为:“档案者乃已办理完毕归档后汇案编制留待参考之文书。”1953 年,德国布伦内克的《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指出,档案是“某一自然人或法人在法律或事务活动中产生,并作为以往活动之查考资料和证据在特定场所永久保存的文件和文献的总和”。1956 年,美国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给出的档案定义是:“经过鉴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已选出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1988 年,吴宝康的《档案学概论》认为:“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像、声音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2006 年,冯惠玲等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认为:“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

4. 学术论文中档案的定义

在档案学学术论文中,关于档案定义的讨论更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表现出强烈的思想创新性、视角嬗变性、语言尖锐性和逻辑思辨性等特点。有研究者认为,档案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力图从逻辑学定义规则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总结出档案的定义。有研究者提出文件材料、历史记录、原始记录、文献、历史文献、固化信息等作为档案属概念的不可行之处,指出记录才是档案属概念恰当选用的对象。有研究者指出:“一部档案概念认识的研究史,就是不断地否定以‘文件’为档案属概念观点的历史。”

(二) 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广阔的概念,几乎与其他任何一个概

念都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组合概念。文化概念的频繁使用使人们对文化耳熟能详，却无法清晰地给予最准确的描述。

1. 文化定义的多样性

在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时间非常久远，源于《易·贲·彖》：“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有：“文，错画也，修饰也；化，教行也，变也。”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有“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有“以文教化”“文治武功”之意，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社会精神的体现。

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出现在15世纪，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ultura”，是耕作土地（cultivated land, cultivation）的意思。不同的学科对文化的定义是不同的。在这些定义中，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色彩。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来理解文化的含义的。其中，静态的文化表现为一种状态和结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整体；动态的文化体现为一种历史和发展，是一个完整的活动和进程。

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与个人》中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初步总结，包括列举和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和遗传性的等多种认识。其中，相当一部分对文化的描述与其说是在给文化下定义，不如说是对文化性质的一种认识：文化是学而知之的；文化是由构成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成分、环境科学成分、心理学成分以及历史学成分衍生而来的；文化具有结构；文化分隔为各个方面；文化是动态的；文化是可变的；文化显示出规律性，可借助科学方法加以分析；文化是个人适应整个环境的工具，是表达创造性的手段。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这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非常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士兵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因素。”他对文化的界定是：“第一，文化可以指一个社会的产物，即人们所说的社会的高雅文化、艺术、文学、音乐和大众文化或者叫民间文化。第二，人类学者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所赋予它们的意义。第三，其他学者尤其是政治学

家，把文化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态度、取向、假定、哲学，即一个特定群体的世界观。”

1871年，西方人类学之父、英国的爱德华·泰勒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中“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2. 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

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正如我们将社会区分为广义的社会和狭义的社会那样，有必要将文化也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义是相同的……狭义的文化与狭义的社会却有不同的内容。后者是通过持续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系统；而前者……是产生于人类行动但又独立于这些的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人们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文化的含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认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作为广义的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作为狭义的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概括起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的总和，涵盖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切文明成果。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文化则主要是指与经济、政治等相区别的观念形态，涵盖了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

3. 文化概念的层次性

荷兰管理学家霍夫斯塔德在《跨越合作的障碍：多元文化与管理》中指出：“尽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但其结构形式大体是一致的，即由各不相同的物质生活文化、制度管理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精神意识文化等四个层级构成。”

对于文化的层次性分析有不同的方法，有两层次说、三层次说和四层次说。一般地，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即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

及其产品的总和，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二是制度文化，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缔结的社会关系以及用于调控这些关系的规范体系；三是行为文化，即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式构成的具有鲜明民族或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四是精神文化，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三）档案的文化价值

1978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指出：作为记录和传递知识、思想的“档案被世界公认为是每个国家的遗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在国家意识和特征的建立中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成为国家文化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的根基、历史的再现、智慧的保障和文明的传承，档案与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因此，档案即文化。

1. 文化记录

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存在都是历史的一转瞬。没有档案的存在，人们无法了解人类历史的进程，更无法认识人类早期的文明。自从有了档案，也就有了文化发展的记录。在某种意义上，《周易·系辞》中有关“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既是档案的缘起，也是文明的发萌。在甲骨档案被发现之前，中国周以前的历史只存在于史书和想象中，缺乏有力证据。直到中国殷商时期甲骨档案的发现，尤其是其中记载的礼制、天文、历法、地理、医学、艺术等内容，不仅将有据可查的中国历史大大提前，同时也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面貌。从尼罗河流域留下的用象形文字形成的泥板档案、巴勒摩石碑和纸草卷《伊浦味陈辞》，可以窥探古埃及文明的神秘；从两河流域用楔形文字形成的泥板档案和刻在黑色玄武岩柱上的《汉谟拉比法典》，可以了解古巴比伦王国的文化精髓。由于这些档案的存在，人类早期的文化成就没有随朝代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而烟消云散。由于档案的社会记忆性，把档案看成“历史文明之母”和“文化之母”是非常正确的。

“档案真实地记载了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世间刻骨铭心的慷慨悲歌”，这是对档案文化记忆价值的最好描述。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最真实的反映，国家的产生使得档案利用需求明确化，史官的产生从国家层面肯定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价值。儒家经典《尚书》堪称中国最早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由孔子整理前人的档案资料而成。尽管博学智慧，作为“万世师表”和

“千年圣人”的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感叹档案的匮乏：“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依赖于历史档案的记载与记录、收集与整理，才有被世人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的问世。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前馆长阿瑟·道蒂指出：“档案是国家的软力量。在所有的国家财产中，档案是最为珍贵的。它们是一代人留给另一代人的礼物，我们对它们的爱护程度标志着我们的文明程度。”联合国《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建议》中提出：“文化遗产除了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外，也包括文献形态的可移动物品，即作为记录和传递知识、思想的文献遗产，如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件档案、照片、电影胶片、录音录像带、机读记录、手稿、古版图书、古籍抄本、现代图书等出版物。”

【案例】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和《中国文献档案遗产名录》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启动旨在国际范围内广泛开展抢救和保护包括手稿、档案、图书和口述历史记录等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世界级文献遗产的“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专门建立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简称《世界记忆名录》，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截至2015年10月，共有100多个国家的346份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和文献集合入选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国已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和南京大屠杀档案等10个项目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世界记忆工程”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主要收集具有地区和国家意义的文献遗产。地区和国家名录并非在重要性上次于世界记忆名录，而是保护地区和国家文献遗产的手段，因为并不是所有文献遗产都具有世界意义。2002年，由国家档案局组织开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评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就是中国的“世界记忆工程”国家级名录。目前已经有四批档案文献入选，总计124项。由于档案的物质载体形态差异，早期的

石刻档案、泥板档案、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缣帛档案等往往同时具备档案和文物的性质。属于金文档案的毛公鼎是国宝级文物，鼎上刻有 499 个铭文，文辞精妙无比，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材料。泰山石刻中的碑碣石刻、典籍石刻、题咏石刻等属于石刻档案，是北齐至唐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反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2001 年，泰山石刻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15 年，四川省档案局印发《四川省档案文献遗产申评办法》，并正式启动首次文献遗产申评工作。为加强全省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整理与开发利用，配合“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在四川省的实施，参照国家档案局关于中国档案遗产申评的有关做法，借鉴其他省市经验，由四川省档案局统筹协调全省档案文献遗产的申报、评审、公布，建立《四川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指导并支持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

2. 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是指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传播和交流的过程，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载体和媒介。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价值的记录，档案和档案工作本身具有极为鲜明的文化属性，档案机构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社会文化机构，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担负着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但是，档案又不同于图书资料等其他类型的文献信息。由于其本质属性即原始记录性等原因，档案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更多的是靠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得以交流和传递。档案文化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更普遍地以间接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的不仅是档案的信息和知识内涵，而且是档案作为文化资源所承载的特定文化内容。虽然，人们更多看见的不是档案最初或者原始的“实体”，但是档案的信息和知识内涵以及所呈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因各种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等而流传后世。

由于原始档案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天然具有的特定局限性，发掘“待字闺中”的档案的文化内涵是发挥档案文化传承价值的根本途径。不管是以直接还是间接的形式存在，档案作为文化传承媒介的价值没有改变。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致辞说：“明天的档案不再是时间流逝后所留下的东西，而是人们预先考虑到要一代一代流传下去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就考虑到将来的档案。”

【案例】

“八千麻袋事件”

1921年至1929年清代内阁档案拍卖、散失、复归的“八千麻袋事件”是中国档案史上档案文化传承的特例。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的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还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清时，“大内档案”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1921年春，北洋政府因财政困难将清代内阁档案分装八千麻袋，计15万斤，以4000银圆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造纸。清朝遗老罗振玉以高价购得部分档案。1924年，罗振玉又将档案以1.6万银圆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1929年，李盛铎又将这部分档案以1.8万银圆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得归公。抗战前夕，其中一部分档案先至南京，后来几经周折迁到台湾。剩下的大约5万斤、约1700麻袋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产，存放在午门楼上。1958年，国家档案局再次进行清理，发现了明崇祯年间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吴三桂的题稿和郑成功抗清的敕谕等。至此，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八千麻袋事件”终于完结。对于学界而言，“八千麻袋事件”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让“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得见天日，从而有了罗振玉的《史料丛刊初编》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料丛刊》和《明清史料》等多种档案文献。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把“八千麻袋”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

3. 文化创新

文化的演化和发展是在逐步累积中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档案本身而言，档案在客观地记录事实、数据和知识的同时，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有限的记忆、认知和获取能力，并且不断地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持续的影响。《尚书》的修辞技巧和语言风格对先秦诸子乃至历代政论文和史书以及官方文书的体例和行文风格都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据说法国文学名著《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这个经典的悲剧式英雄，来自作家雨果最初看到的警方档案中记载的一起刑事案件。文化的发展和创

新离不开档案，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发展和创新是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赖以存在的前提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 2003 年在考察浙江省档案局时指出，正是由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存在和发展，“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这是对档案的文化创新价值的高度认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创造，是建立在有效的文化传承之上的文化创新。档案是人类历史最完整的记录，是社会发展最真实的写照。文化记录是基础，文化传承是手段，文化创新是方向。通过科学系统的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可以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管理决策和社会发展服务，以档案收集和整理为基础，以档案资源开发为途径，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从而将文化记录、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温斯坦指出：“公共服务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为每一位公民、为所有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为总统、国会以及法院提供档案服务，是我们的工作重心。国家档案馆的馆藏属于组成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美国人民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致力于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事实是，美国档案馆不只是政府或历史收藏机构，更是普及教育的地方。”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不仅要重视档案的文化传承，更要重视档案的文化创新，服务于现实和未来的发展。通过开展有效的档案文化教育价值，发掘丰富的档案资源中深刻的文化内涵，不仅可以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而且可以增强社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文化前进。

2016 年 1 月 14 日，在韩国国家记录院“总统档案馆”新馆开馆典礼上，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指出，创造性的未来源于对历史的省思，创新的源泉在于丰富的历史记录，希望韩国的记录文化保存系统能和电子政府、新村运动一起在行政领域掀起“韩流”，为文化繁荣做出贡献。其中，她特别强调的所谓记录文化即档案文化，肯定其在文化繁荣中的贡献是对档案文化的创新功能的高度认同。

【案例】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

梵蒂冈秘密档案作为与教皇有关的专门档案资源，同时也是过去 8 个世纪以来的“一份世界历史纲要”，人们可以从中挖掘出欧洲文化的历史细节，更能探求欧洲文明的发展脉络。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珍藏着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献：有来自罗马贵族家庭的档案和账目，罗马教皇的登记册、外交往来信件和教会法庭卷宗，上百万条的信息、数据、名目和契约记录着关于教皇、战争和改变世界的地理发现的故事，以及众所周知的天主教炽热信仰与危险异教之间的荣枯兴衰。

●43 公里长的书架，54 位工作人员

“档案馆内有 43 公里长的书架。”早上 7 点，档案馆的阅览室已经开始人头攒动。头天学者们阅览过的成批档案被重新放入档案室储存并排序。每位工作人员都已各就其位，馆长和副馆长都已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几个小时之内，学者们会通过圣安娜门鱼贯而入，然后坐在各自的桌子前开始聚精会神地工作。

每隔 30 或 35 年，全世界分属于罗马教廷的教廷使馆将它们各自的档案全都汇集到罗马来。还有一些材料来自罗马教廷、宗教团体、法庭和办事机构以及意大利的私人家族，成百上千的资料如雪片般增添进已有的档案中。

●“至今仍在整理来自中世纪的档案”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官方建馆时间是 1612 年，由教皇保罗五世建立。但它的非官方历史可以追溯得更早——早在 16 世纪，就有来自民间的人士给教皇写信，提出他们的主张。秘密档案中的“秘密”其实是“私人”的意思，指的是这些档案只属于教皇本人。

由于早期基督教兴起时曾经受到迫害，教会一直以来都怀有强烈的保存自身历史的需求。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敕令》使天主教信仰合法化之后，礼仪抄本与合法文件都开始被收集起来。这些资料到今天多已不存，战争、掠夺和火灾已经将整个历史纪元时期的记忆扫除殆尽。

秘密档案中最早的文件可追溯到 8 世纪和 9 世纪的《罗马教皇日志》，一本有关教会规程最古老的记录。还有一张 809 年的羊皮纸记录了对意大利维罗纳地区教堂的一次捐赠，这份记录属于由 1.7 万张羊皮纸组成的“威尼托集子”的一部分。

●每一件档案都是私人的，也是公开的

在“贝佳斯集子”中另一份年代更早的档案里，可以看到“一则关于土耳其军队和天主教军队在 1571 年 10 月 7 日这天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报告，由指挥官罗马卡索起草”。这是一份战况报告，来自天主教和奥斯曼人之间那场著名的勒班陀战役。